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Networks of Chinese Confucius Institutes through the Mode of Strategic Stakeholder Engagement

Xiaoyi Zou and Zheng W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854692107@qq.com

Abstract

Under the mode of strategic stakeholder engagement, the Chinese Confucius Institutes promote China's soft power effectively through the commitment and corporation with its local stakeholder worldwide in ten years. As the networks sponsor, the Confucius headquarters build a comprehensive and resourceful network through approaches of network structure, network synergy and network strategy.

Keywords: *Strategic Stakeholder Engagement; Confucius Institutes; Network Structure; Network Synergy; Network Strategy.*

孔子学院文化传播网络研究—基于战略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视角

邹小羿¹ 和王珍^{*,2}

¹成都大学

²云南师范大学

摘要:

该文章基于扎哈娜提出的“战略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 (strategic stakeholder engagement)理论,以全球孔子学院发展现状为对象,分别从构建“战略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的三大要素出发即:“网络结构”,“网络协同”和“网络策略”,对孔子学院多样性的社会运转机制以及关系网进行分析。该文主要探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战略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下,孔子学院如何利用当前全球对汉语及中国文化的高昂兴趣,通过与全球各地作为合作伙伴的“战略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在提升中国软实力上,如何在短短十几年间用最少的物力和人力取得了巨大的效果。第二,孔子学院如何协助“战略利益相关方”建立起关系网实现了教育体系和社会环境的双层嵌入,努力在结构、协同、与策略三个层面紧密贴切当地需求,通过多层次多主体的合作,将教育与文化在多样化的综合网络中得以有效的传播。

关键词: 孔子学院, 战略利益相关者, 软实力, 文化, 外交

1. 引言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中国在原有物质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力图寻求新的有力模式提升软实力。从孔子学院的诞生到繁荣,全球见证了汉语学习及中国文化的崛起,并且热度不减。2004年,在韩国诞生了世界第一所孔子学院,直至今日,全球共创立孔子学院471所。就其在全球日益扩张的影响力,孔子学院无疑被国内外专家视作中国公共外交的功臣,更是中国软实力的新要素。全球软实力之父,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Nye Jr, 2004)在1989年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其指一国的文化以及其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的吸引力,同时也包括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等资源。简单来说,一国软实力的资源包含其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以及其外交政策。(Nye Jr, 2004)纵观人类历史的区域权利系统,世界强国都将其文化感召力,其语言传播作为有力工具提升其软实力,如法国的法语联盟,美国的和平队,德国的歌德学院,而孔子学院的快速发展作为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在全球也备受关注。



2. 战略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下的孔子学院

国际知名学者扎哈娜教授 (Zaharna et al., 2014) 曾指出：公共外交的客体是广大外国民众，而其主体即可是政府也可以是非政府组织；狭义的公共外交包括文化教育交流、对外广播和领导互访活动，广义的公共外交则包括语言与文化中心，民间交流等。(Zaharna et al., 2014) 以澳大利亚为例，据统计，中国在澳大利亚共建立 13 所孔子学院，35 个孔子课堂，这无疑是中国在大洋洲的重要公共外交中心，也是在全球推广中国文化、语言、价值的重要基地。公共外交与软实力息息相关，因为通过软实力可以有效地获得公共外交的目标，赢得全球民众的认同和支持。扎哈娜认为，中国孔子学院以文化与语言传播为重点，全球各地方孔子学院间有着多主体与多层次的协同合作。而现有西方的文化机构是相对独立的实体，彼此间缺乏联系和交流。(Zaharna, 2011) 就澳洲的孔子学院为研究对象，将其视作全球孔子学院普遍模式的代表，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种独特的模式使其在短短十年间，在各大强国的文化机构中异军突起，很大程度上让中国的文化身份得到承认和尊重。

在公共外交领域上扎哈娜首次引入“战略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这一新概念 (Strategic stakeholder engagement)，并指出参与的积极性与关系网建立的模式密切相关。一个成功的关系网最明显的标志是，战略利益的相关者从赞助者手里接过接力棒积极的为其开展相关工作。赞助方则要提供工作的启动平台、协助战略利益相关方建立关系网，最终使关系网茁壮成长、战略利益相关方进而在今后也具有独立开拓工作的能力。构建这一模式有三大要素，即“关系网的结构”(network structure, 简称网络结构)，“关系网之间的协同”(network synergy, 简称网络协同)以及“建立关系网的战略”(network strategy, 简称网络战略)。(Zaharna, 2011) “关系网的结构”对信息的流通传递至关重要；“关系网之间的协同”助力于开展各种合作关系，加强合作的多样性；“建立关系网的战略”则注重如何使参与者在合作中共建相同的身份价值、话语模式，为共同创建良好的信誉而努力，而不是简单的向外传递信息而已。而被国际很多学者视为提高中国软实力的有利外交工具的孔子学院，正是“战略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下的最佳体现。

扎哈娜认为公共外交拥有交互性的特点，并囊括以下几个要素：传播目的、传播模式、构想、目的、赞助方等 (Zaharna et al., 2014)。而公共外交网的结构在性质上各有不同：有的结构紧密，有的松散；有的主体性质相似，有的主体则呈现出多样性。(Zaharna et al., 2014) “交互式公共外交的目的并非创造并传递游离于受众之外的信息，而是通过建立网络结构来实现网络受众体之间信息的有力传播。”(Zaharna et al., 2014) 这种公共外交模式将与受众的关系视为核心，旨在能在传播过程受众首先架构出一个社会网络，而公共外交的实质是行为体在该社会网络的框架的互动交流。此外，社会网络也与现实的社会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社会网络这一媒介，公共外交的施动方与受众方得以彼此连接，通过社会网络中的行为体双方共同连接，协力创造出属于这个社会网络自己的文化与价值。孔子学院就是体现中国重视全球关系和社会网络的一个公共外交举措。

文化机构是文化教育关系网络的最好体现。除孔子学院，全球绝大多数文化机构都是独立运作的。扎哈娜认为，中国的文化外交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模式，其很多方面值得西方国家借鉴与研究。例如，区别于西方文化机构的独立运作模式，各孔子学院间有着多向多层次的联系。近观孔子学院的运转机制，一方面不仅与当地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展工作，另一方面同时架构非政府的关系网络，充分利用“战略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的特色，打造出一个自发联动性的文化传递关系网。在全球化背景的驱动下，语言文化主体要达到信息传递的最大化目的，则要在当地合作方现有的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关系网上编织出充分的跨文化合作网络。孔子学院的文化教育传递层次多样，其合作方式极为丰富，在其全球多种合作模式的背景下，与不同行为主体间互动所产生的效果成为全世界文化机构运作的优秀模式。衡量一个文化机构是否成功，最为重要的因素是看其是否拥有能打造出环环相扣的关系网的策略，而策略的核心是调动合作方的能动性，即主动参与工作的开展、创新的积极性。以法语联盟，歌德学院为代表的全球多数文化机构只是简单地由文化主体国“种植”到全球各地，从文化资源到人事资源完全独立于当地即有的背景资源。不同于单独“种植”的模式，孔子学院则是通过合作伙伴关系，在当地固有的本土教育机构上（如各高校、地方教育局、中小学及社区学校。）“嫁接”到全球各地地当地文化背景。通过这种方式，孔子学院在发展社会关系网的同时也



融入当地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看到其避免了可能产生的文化冲突，最带限度地保留了语言文化传播的活力。

接下来本文将以全球孔子学院发展现状为对象，通过扎哈娜提出的“战略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的三大要素即：“网络结构”，“网络协同”和“网络策略”，对孔子学院多样性的社会运转机制以及关系网进行分析。

3. 孔子学院的网络结构

从“利益相关者参与程度 (stakeholder engagement)”来看，就合作发展，孔子学院独特的的合作伙伴关系发比其他独立的文化机构更高一筹，它提供了与不同主体间交流的重要平台。在这种合作模式下，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也具有持久性和粘性，孔子学院在各地“嫁接”的文化传播网络，以及在强大而多样化的合作机制下，所构建的文化传播功能源源不断地得到巩固与可持续地自主发展。每一所孔子学院不仅与中国本土某教育学术机构形成一对一紧密地资源连接与合作，同时其本身也直接和位于北京的孔子学院总部相互连接合作。

网络结构 (network structure)的核心是协助信息的交换和流通，并使整个关系网络有效的运作。如果将全球各孔子学院当作网络“前哨基地”(network outposts)，那位于北京的孔子学院总部(即汉办)则是“网络中枢”(network hub)，间接将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链接起来。两种信息传递的模式在网络中并存：一种是前哨与中枢之前的信息双向流通，另一种则是各地作为前哨基地的孔子学院之间的信息多向流通。自2006年以来，国家汉办连续每年举办全球孔子学院大会，如2011年的全球孔子学院大会，超过2000个来自105个国家的代表团出席此次会议。尽管有批评家指出，这些来自各地的“战略利益相关者们”一定程度上是抱着为将来的活动经费的目的前来游说，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在各种层面的交流、不同板块上的讨论，对大量规划的沟通，众多实质性的有价值的信息在这网络当中得以流通、分享，各种资源源源不断的流向各个网络前哨。除了全球会议，国家汉办也组织不同的区域性会议，如2012年由汉办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共同举办的“亚太地区孔子学院大会”，超过260位来自98个国家的代表与会。而在各个国家，汉办也会不遗余力的开展交流大会，如在美国每年举办全美中文大会，在英国举办全英中文大会，同时也积极地与各地的即有资源寻求合作，如参与澳洲本土教育部举办的全澳中文教师大会等。通过诸如此类的会议，各地的战略利益相关者有机会与同样身份的代表方分享经验，交流思想，源源不断地为未来地合作发展注入动力，获得各个层面的文化传播。与其他文化机构单一的文化主体国直接植入的单一社会关系网络体系形成对比的是，孔子学院社会关系网层次错综复杂，极为丰富，既可以是全球范围内的孔子学院形成的整体社会关系网，也可以是按某一类孔子学院形成的类型社会关系网；既可以是按区域形成的区域社会网络，也可以是单个孔子学院所形成的社会网络。(王彦伟, 2013)

这些针对不同区域的会议在关系网的各个层次获得传播效果，并通过各个层次的互动。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融合在一起逐渐形成受到普遍认同的多元文化价值体系，实质上让战略利益合作方产生归属感，借此建立的关系才得以长久发展和稳定，作为总部的汉办进而与海外的战略利益合作者们产生持久的互动。在这种网络体制下，各地的孔子学院之间也积极响应、互动，从社会网络中获取文化与教学资源，为将来的运作注入活力。与此同时这些会议有效地向海外各孔子学院传递了来自赞助方的讯息，时刻提醒他们作为合作者应履行的义务和应开展的工作。然而关系网中各主体的沟通和其信息的流通也存在着很多障碍。据研究中国公共外交的学者福柯·哈丁格 (Falk Hartig) 对澳洲孔子学院的调查，有的孔子学院在向总部提出新的活动企划后，往往发现总部对企划的资助和可行性分析答复与预期的相去甚远、或迟迟不做出任何可行的指示和回应。又如有的孔子学院发现当新的项目运行到一半时，总部却在预先默认的情况下中断相关资源的支持和指导。(Zaharna, 2010)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心和外围的信息流通与互动并非总是简单而有效的，另一方面，在汉办精心打造的纵横交错的关系网中，各孔子学院之前虽有着很多渠道交流工作心得，然而这种沟通也是十分松散的，缺乏有利的整合。就不同孔子学院之间如何开展合作，没有正式的合作模式可依。作为网络中枢的汉办应当提前规划，并为各利益合作方内部的合作提供有力的规范以及有效的官方渠道。就目前来看，所谓的合作很大程度都是建立在各种私人关系上，如学院工作人



员通过私人关系，互相邀请其他学院的相关学者前来开展讲座，或共同开展活动项目。由于缺乏统一的合作模式，各战略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松散且过于贫乏。而这些存在于网络结构中问题正好带出“战略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的第二个要素——“网络协同”。

4. 孔子学院的网络协同

“网络协同”(network synergy)的目的是在关系网中搭建合作关系与吸收多样性；网络协同体现在各个网络成员间相互凝聚进而产生乘数效应(force multiplier)——简单来说，就是“包罗万象”和“人多力量大”。上一部分所提到的问题，即个孔子学院间的合作过于松散正是由于网络协同不足所造成的。那么如何加强网络协同的答案是什么呢？扎哈娜指出，向网络中注入多样性的运作模式能提高网络协同。孔子学院的内部结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孔子学院在资源和配置上给不同的受众定制了多样性的内容，其主要活动横跨学生、教师、社会人群三大对象：向在校学生提供不同层次的语言课程、多种文化活动如中国书法、茶艺、太极等；开展各类中文教师培训并组织实施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能力认定测试；面向社会举办为推广汉语和传播和中国文化的展览、演出或竞赛活动；除了组织开展 HSK 汉语水平考试以外，还就当地特色开发符合当地需求的汉语考试；并向社会提供相关中文商业和跨文化的培训；除此之外，孔子学院也组织开展汉语和中国问题研究等学术活动。

除了多样化的资源设置，同一地区的各个孔子学院在这种网络关系中也形成了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进而自发地寻求自身独特的发展方向 and 特色，大大丰富了孔子学院的创办特色和模式。以澳洲主要孔子学院为例：在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这样的大型城市，每座城市都拥有不止一所孔子学院。如在布里斯班，昆士兰大学孔子学院特别关注中国近代科学与工业对全球的贡献，而同一城市的昆士兰科技大学孔子学院则以培训当地汉语语言教师为特色，吸收社会上的相关资源和关注。几乎所有的孔子学院都意识到打造自身独特品牌的必要性，在市场上寻求正确的定位，互相弥补，避免重复，是整个机构良好运转的前提。有的孔子学院侧重向当地社区辐射，通过将汉语教学、文化交流与社区服务等途径连接起来开展工作；有的则只针对面向合作大学内部的师生开展汉语教学与中国文化研究。多样化的定位不仅体现在孔子学院之间，也体现于孔子学院与当地的社会背景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的精神当中。这种多样化的嵌入，使孔子学院网络实现了教育体系和社会环境的双层嵌入、理念与地域的双重跨界，同时紧密贴切当地需求，通过多层次多主体的合作，教育与文化传播形式发展为一多样化的综合结构。值得注意的是，诸如此类的各地孔子学院呈多样化的运作模式与特色并非总是由远在北京的总部提议并推动的。虽然海外各大孔子学院的建立和运作与中方汉办总部的启动工作与后期支持密不可分，但对各地的合作方而言，如何从当地资源获取价值是他们十分关心的，同时身为整个网络的战略利益相关合作者，也会考虑将孔子学院看作独立的机构，放眼当地市场，考虑如何在当地市场得以生存和发展。

5. 孔子学院的网络策略

从表面上看全球的孔子学院星罗密布、遍地开花，各地的“战略利益相关者”们也看似不遗余力地为适应当地市场，获取更多的相关资源而相互协同而努力。海外孔子学院是否真正的做到“接地气”，就要看在“战略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下的第三个维度——“网络战略”。“网络战略”的目的是通过利用可靠信息，使参与者在合作中共建相同的身份价值与话语模式，为共同创建良好的信誉而努力。网络体系中，可靠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其拥有的价值和合法性。在这种模式下，孔子学院能否提供符合海外当地兴趣的资源、是否能吸收接纳当地的社会热点、是否能贴切当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根据孔子学院章程第六条和第七条规定：所有孔子学院不参与同孔子学院设立宗旨不相符的活动。孔子学院遵守注册地法律、尊重当地文化教育传统与社会习俗的同时，不得与中国有关法律相抵触。这些规定表明，当地地文化传统和中国法律法规产生任何可能的冲突时，孔子学院员工应当具备处理好这些矛盾的能力。以澳大利亚各孔子学院为例，福柯·哈丁格调查显示，各孔子学院的当地合作方并没有遇到此类冲突，与中方的合作方的工作开展顺利。中方几乎不会正面强调、提出中方在法律和政治等方面地立场。有的表示，平心而论，汉办并没有在教学内容上做出干预，

[20]



更多地则是慷慨地予以各种资源的支持。有的称赞道，中方与当地合作方单位台湾籍老师出色的合作让他们之前无需有的担忧被完全打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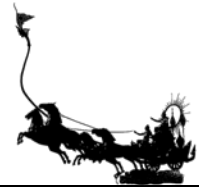
无可否认的是，很多西方国家媒体，在对中国的领土问题、涉及台湾、西藏、达赖哪吗等问题十分关注。然而通过采访可以看到，在澳洲孔子学院的海外合作方都约定俗成地对此采取务实的态度，将这一切划定在工作可能会涉及地范围之外，均表示对敏感地政治问题不感兴趣，唯一的兴趣是如何开展学院的工作。这一切并不能说明海外孔子学院拥有一套自我审查地系统。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很显然很多合作者不愿意以失去汉办资助为代价而与任何与中方冲突的立场相关联；第二，虽然西方政府之前担忧孔子学院会通过教育和文化资源传播共产主义、红色思想、进行价值观输入，但通过多年的证实，孔子学院只涉及中国的历史、武术、书法、中医等文化，且更多的只是教授汉语而已。然而在美国却出现了轰动一时的驱逐孔子学院出境的风波，虽然只持续了三天，但这足以成为孔子学院自成立以来所经历的最大一次冲击。在福柯·哈丁格看来，由于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孔子学院虽是语言文化机构，但不可能与其国家体制完全分离，固而一方面既无法涉及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话题，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与合作方当地的隐形文化和制度产生摩擦。法语联盟，歌德学院等同为西方意识形态阵营的其他语言文化机构则不会遇到类似的冲突。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给孔子学院在网络运作战略上带来了一定局限性，正是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直接导致关系网顶端的中枢无法提供与当地文化，政治等各种热点相挂钩的信息资源，网络所生存的“土壤”营养不足，势必会造成各种问题。孔子学院发展的十年间，西方学者对孔子学院会影响当地的学术自由的担忧一直从未停止，至今孔子学院在全球并不涉及任何学术性的研究，这也让他们“松了口气”。2011年汉办准备开始实施“新汉学国际研究计划”，旨在全球培养更多有更高造诣的汉学家，并即将开始全球招生。如果之前的十年汉办仅限与在网络内部通过网络战略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那“新汉学国际研究计划”无意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这无疑又会让更多对不同意形态持狭隘态度的西方学者们再一次“绷紧了神经”。因此，孔子学院在将来如何在嵌入不同国情和意识形态的网络中，提供并管理各种资源并有效地传播，摈除不同意形态带来的局限性这永远是维护促进整个网络的良性运转的重点和难点。

6. 结论

在“战略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下，利用当前全球对汉语及中国文化的高昂兴趣，通过与全球各地作为合作伙伴的“战略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在塑造中国软实力上，孔子学院在短短十年间用最少的物力和人力取得了巨大的效果。而汉办协助战略利益相关方建立其的关系网实现了教育体系和社会环境的双层嵌入，努力在结构、协同、与策略三个层面紧密贴切当地需求，通过多层次多主体的合作，教育与文化在多样化的综合网络中得以有效的传播。当涉及到资源信息时，海外各孔子学院所处的文化氛围所感兴趣的信息资源也许和孔子学院能够提供的资源存在鸿沟。研究背后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不同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背景为其发展带来一定的局限性，这也驱动着整个网络机构需要嵌入更多的文化契约来维持合作。除此之外，中国要走向全球化，全面复兴其软实力，放眼未来，就推广孔子学院的过程，对原本无法轻易接受的事物保持开放的心态也许是一个趋势。只有预知、提供并分享海外受众的需求与选择，才能提高全球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可度，通过各战略利益相关者建立起来的关系网才能长久稳定，并持续推动与孔子学院长久的互动。

7. 参考文献

- 王彦伟. (2013, 4). 孔子学院的利益相关方及其互动关系:一个分析框架.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3.
- Nye Jr, J. S. (2004).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 Zaharna, R. S., Arsenault, A., & Fisher, A. (Eds.). (2014). *Relational, networked and collaborative approaches to public diplomacy: The connective mindshift*. New York: Routledge.
- Zaharna, R. S. (2011). Relational spheres and the primacy of domestic and diaspora publics in global public diploma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Montreal, Quebec, Canada.*



- Zaharna, R. S. (2011). The public diplomacy challenges of strategic stakeholder engagement. In *Trials of Engagement* (pp. 201-229). The Netherlands: Brill Nijhoff.
- Zaharna, R. S. (2010). *Battles to Bridges. U.S.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Diplomacy after 9/11*.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